

相映、相對、相發： 屬辭比事與《史記》敘事評點

邱詩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約聘教師

提 要

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本文從史傳背景考察，討論《史記》屬辭比事的敘事策略。運用明清評點材料，梳理清代評點家鈞稽《史記》對稱敘事的歷程。則知桐城派自方苞以下，尊奉《左》、《史》，注重《春秋》屬辭比事的概念，先立其大，奠定正確閱讀《史記》的方向，提出「相映」概念，指出《史記》敘事有其結構的對稱性。後來在王又樸、吳汝綸的進一步闡發中，對稱敘事的偶對義法逐步成形，並精益求精，從「相映」到「相發」，注重其文、其事、其義合一。故史傳與敘事之間，透過屬辭比事和偶對義法，便有自史法融通到文法的清晰脈絡。

關鍵詞：《史記》 司馬遷 敘事 屬辭比事 《史記》評點

相映、相對、相發： 屬辭比事與《史記》敘事評點

邱詩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約聘教師

壹、前言：《史記》敘事研究述評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❶史傳文學爲敘事傳統之要項，討論敘事傳統，不能略過史傳文學。史爲《史記》，傳爲《左傳》，故所謂史傳文學，即指以《左傳》、《史記》爲典範的敘事文學傳統。《史記》歷經千年流傳，已成專學，兼具史學、文學價值，成爲學界定論。以敘事傳統觀之，《史記》文字，影響後世古文、小說、戲曲創作甚鉅，是敘事文學的典範。然而，《史記》對於後代敘事文學的實際影響，其敘事文學之研究、理論，卻是在明清評點家手中，逐步建構而成。

評點，是敘事學的獨特存在型態，具有黏附於直覺的思維特質，^❷是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模式。評點包括圈點與批評二部分，前者有圈、點、抹等形式，後者則包括眉批、夾批、旁批、總批，也稱爲眉評、夾評、旁評、總評。^❸唐代《史記》學重註釋、論體例，開始留意《史記》之文學價值，概括《史記》之敘事風

❶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頁151。

❷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330-348。

❸ 高津孝：〈明代評點考〉，收於章培恒、王靖宇主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87-88。

格。宋代史評、史論漸多，卻側重品評人物、比較班馬異同；論其文章者，多為散見於文章的片段評語，而蘇洵提出的「互見法」，開《史記》敘事研究之先河。^④迄至明代，復古派尊奉《史記》為古文經典，《史記》以文章寫作範本的面目，被文人所重視，而進一步評點其辭章，聚焦其行文之法。^⑤明代《史記》評點盛況空前，而有《史記評林》的集成之作。《史記評林》是匯集明萬曆以前諸家《史記》評點之大成，其中雖涉及《史記》文法，卻是混同「文章之法」與「敘事之法」，可被視作敘事文學批評史上從傳統的「文章之法」向「敘事之法」轉變的過渡性特徵。^⑥故自明清文人《史記》評點文字，得以按圖索驥，觀察出中國敘事傳統中《史記》的敘事特質。

中國現代學者受西方文學理論影響，也開始運用西方美學、西方經典敘事理論、後現代敘事理論等，歸納《史記》的敘事特色。^⑦以美學切入之著作如宋嗣廉《史記的藝術美研究》^⑧、韓兆琦《史記的悲劇性》^⑨、張新科《史記與中國文學》^⑩，集中討論《史記》的諷刺美、悲劇美。而以敘事理論討論者，如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⑪、劉寧《史記敘事學研究》^⑫等，討論敘事中之結構、時空、虛擬、矛盾、誇張等種種方面，皆借鑑西方文學理論，對《史記》文章敘事剖析有所開拓。

-
- ④ 張新科：〈史記研究史述略〉，《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6期（2005年），頁5-9。
- ⑤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說》（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頁237。
- ⑥ 周建渝：〈從《史記評林》看明代文人的敘事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3期（2010年），頁87。
- ⑦ 劉寧：〈歷代《史記》敘事研究綜述〉，《江淮論壇》2006年3期（2006年），頁170-175。
- ⑧ 宋嗣廉：《史記的藝術美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版）。
- ⑨ 韓兆琦分三章討論《史記》的悲劇性、抒情性、諷刺藝術等，見韓兆琦：《史記通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30-162。
- ⑩ 張新科曾專章研究《史記》的悲劇範疇與類型。詳見張新科：《史記與中國文學》（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22-144。
- ⑪ 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18-150。
- ⑫ 劉寧：《《史記》敘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西方敘事學的角度考察《史記》文本，固然可以一一揀選出對應的筆法。然而，同樣的美學分析、敘事筆法，也可以用以點評《三國》、《水滸》、《紅樓》等，任何一種中國傳統敘事經典，形成各部經典有著大同小異的面貌。故以西方理論類比中國敘事傳統，若僅是筆法上的借用，雖能將文本分析細緻化，但卻不易理出個別文本之敘事特色，以見其經典意義。筆者以為，欲探究敘事傳統中《史記》之敘事特性，應請循其本，溯源史傳文學的因緣，回歸司馬遷的創作背景，以明清評點為指南，以勾勒出《史記》之敘事特色，建構敘事傳統中相關理論。則完成此論題，除可耙梳《史記》敘事之特色、增補中國敘事傳統之環節，並能歸納相關評點文字，鉤稽出中國敘事傳統理論中，源自史傳傳統的元素。

貳、《史記》屬辭比事的敘事策略

歷史，包括歷史本體、歷史材料、歷史解釋三部分。歷史本體隨著時間的流轉，已無法重現，必須透過種種史料的記述，得以保存；歷史解釋不能架空歷史，必須依循著史實而發。十九世紀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歷史學派，試圖將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二分，追求趨近「真空」的歷史事實。¹³然而，歷史敘事是歷史流傳的主要載體，歷史解釋應依附在其中，並非獨立存在。故西方史學界修正歷史學派的敘事、解釋二分法，強調敘事兼有解釋的意義。如余英時《戴震與章學誠》一書，比較西方柯靈烏（R.G. Collingwood）的歷史觀點，解釋敘事之筆削，實際包含史料的取舍、歷史建設、歷史的批評三面向，三者同時兼有歷史敘事和歷史解釋的成分。¹⁴而後現代史學宗匠的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亦提出所謂「情節化解釋」，乃通過識別所講故事的種類，為故事提供

¹³ Edwaed.H.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台北：幼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十一版）。及 John Tosh 著，趙干城、鮑世奮譯：《史學導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88 年）。

¹⁴ 余英時：《戴震與章學誠》（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1 台影二版），頁 215-225。

「意義」，就是所說的通過情節編排進行解釋。¹⁵換言之，敘事本身，包括史料取捨、連屬文字，即兼有歷史解釋的性質。

中國史官，自上古甲骨卜辭中的「某某卜，史貞」的巫史合流，至周朝，演變成獨立記言、記事的職官。《禮記·曲禮》：「史載筆。」，又《禮記·玉藻》亦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則天子之側，諸侯之旁，盟會之時，讌私之際，皆有史官，及時記載。¹⁶考周代史官，其職掌大致以「禮」為核心，可詳析為執禮、掌法、授時、典藏、策命、正命、書事、考察八類。¹⁷分工越趨細密，但仍不脫《禮記·曲禮》所言「史載筆」的範圍。則史官既然以「載筆」作為主要工作，如何詳實的紀錄歷史真相，就是史官的存在目的，並逐漸發展出「君舉必書」、「無國不記」等載筆原則。¹⁸透過紀錄史事，成為王權的監督系統，而有董狐、夏父展等稟筆直書的良史出現。然而，儘管史官以「君舉必書」、「無國不記」之載筆之理想，但仍然是王權麾下的一員，史權無法凌駕於王權。當載筆可能觸犯忌諱時，就必須用迂迴的方式呈現，方能保全史官自身的安全。故委婉顯諱，推見至隱，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在中國史學傳統，敘事與解釋本非截然二分。《禮記·經解》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禮記》直指《春秋》特色，即於「屬辭比事」四字。何謂屬辭比事？屬辭，乃連屬前後之文辭；比事，為類比其相關相反之史事。因此可以推得，《春秋》之作，是運用史事、人物之對比，運用敘述文字串連起來，讓讀者望文生義，褒貶

¹⁵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陳新譯：《元歷史：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頁8。

¹⁶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42-43。

¹⁷ 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頁3-5。

¹⁸ 「君舉必書」、「無國不記」，分見《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僖公七年。詳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台北：洪葉文化，1993年），頁225-226、318-319。

自見。故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稱《春秋》一書，乃「記天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¹⁹以《春秋》而言，《孟子·離婁下》稱：「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史之成書，有事、文、義三重含意。「其文，則史」是屬辭，「其事，則齊桓、晉文」，就是「比事」。透過事件的比較，辭的連結，才能把「其義，則丘竊取之」的「義」，呈現出來。屬辭、比事是敘事；其義，是解釋。則屬辭比事，就是寓歷史解釋於敘事之中，雖未有獨立的文字篇幅，卻透過比事屬辭的方式，呈現「甚幽而明，無傳而著」的效果。

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曰：「《春秋》比事以屬辭。」，乃就歷史編纂的角度，說明史書編寫，先排比史事，後連屬文辭之次序。故章學誠以「比事屬辭」稱「屬辭比事」，較符合史書編寫的程序。而方苞《春秋通論》稱：「案所屬之辭，核以所比之事。」²⁰，乃就讀者角度，從史書的文字敘述，核查其對比的史事，以探求其義。承前所述，屬辭比事可視為歷史敘事，而歷史解釋依附在其中。然而應當注意的是，在屬辭比事之中，「比」的意義。屬辭比事，謂連屬前後文之辭，以比觀其相類或相反之事，以見筆削褒貶之微言大義。²¹則比者，包括類比、對比，乃選擇二個相近、相似、相對、相反的人物或史事，故稱比事。張高評曾於〈《史記》筆法與《春秋》書法〉一文中，揭示「『屬辭比事』之《春秋》書法，在《史記》一書衍變為『互見』之史法。」，並指出廣義之互見，表現在「此詳彼略，互為補充；連類對比，兩相照應」各方面。²²則以此觀之，不論是屬辭比事或互見，在此皆以比事為核心，而在此前提之下，梳理其下啓之敘事傳統，當關注其兩兩相映之敘事特色。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稱孔子作《春秋》乃「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

¹⁹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卷2，〈竹林第三〉，頁39。

²⁰ 方苞：《春秋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文津閣四庫全書》第61冊)，頁433。

²¹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頁82-83。

²² 同前註，頁83-85。

義法。」，約其辭文，乃指夫子整理魯《春秋》之敘事文字。重，意指重複，是針對史料進行取舍。則「約其辭文」是「如何書」，就是「屬辭」；「去其煩重」是「何以書」，就是「比事」。又於〈匈奴列傳〉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司馬遷身爲武帝朝史官，欲通古今之變，資鑑當代，則〈匈奴列傳〉贊語，既記述孔子作《春秋》之心態，又何嘗不是太史公之自況？《春秋》屬辭比事之教，太史公私淑孔子，透過人物、事件的對比，串連成篇，寄託歷史解釋於其中。故總的來說，《史記》雖易編年爲紀傳，分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體，各載其事其人，然實際仍舊是在《春秋》比事屬辭的指導下，進行史料的剪裁安排，寓其義於其文之中。而欲論《史記》其文之敘事特色，則當聚焦「比事」，梳理其相類、相反之章法結構，以見其兩兩相映之偶對義法。

參、桐城派對於《史記》評點對稱敘事之發掘

司馬遷私淑孔子，效法《春秋》其文、其事、其義的書寫方式，編纂《史記》，有其「成一家之言」的企圖心。故《史記》行文，即類比《春秋》書法，以屬辭比事爲主要核心。與屬辭比事相通，《史記》之互見法，雖由宋代蘇洵所提出；而明代《史記》評點著作中，亦偶見相近詞彙；實際將屬辭比事運用於評點，進而闡述《史記》對稱敘事²³者，則是在桐城派義法說中，得以建立。

桐城派義法說，肇基於方苞（1668-1749）；方苞的古文理論，啓發自萬季野的史法。章學誠云：「史家敘事之文，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即說明《春秋》書法與史家敘事方法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補充說明「必具紀傳史才，乃可言古文辭。」²⁴。則《春秋》書法、史家筆法、桐城義法三者之間，實有一脈相

²³ 對稱概念源自美學，又稱爲均整，是指在視覺的畫面中，設一假想中的軸線，在此一假想軸約兩端分別放置完全相同的形體，即成對稱的形式。本文將美學上的對稱，移用於文學評論，注重作品的取材內容、敘事方法等各種方面的平衡。

²⁴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外編卷1，〈信撫〉，頁836、831。

承的薪傳關係。方苞《春秋》著作分別為《春秋通論》、《春秋比事目錄》、《春秋直解》三種，乃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意，貫穿全文，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為舊文，孰為筆削，分類排比。《春秋通論》成書於康熙五十五年，排比《春秋》經文類似事件。²⁵書成之後，應弟子程峯（1687-1767）、王兆符（1681-1723）等要求，次年完成《春秋直解》，逐年解說經文記載異同之故。據學者推測，《春秋比事目錄》成書應在《春秋通論》與《春秋直解》之間。²⁶方苞《春秋》三書，明顯即是貫徹「屬辭比事」之教，以比事為核心，闡發《春秋》要義。換言之，《通論》是比事的結果，《直解》是逐條論述屬辭與比事的關係，而《比事目錄》，就是他用以比事過程的參考資料，書成，提供學人按圖索驥。

前已說明，方苞著《春秋》三書，貫徹「屬辭比事」之教，以比事為核心，闡發《春秋》要義。方苞〈又書貨殖列傳後〉曰：「《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²⁷，自書法類推到義法，用屬辭比事的眼光評點《左傳》、《史記》義法，自然也聚焦於「比事屬辭」之法，致力勾勒文章「相映」之處，以窺得行文「比事」之所在。如方苞評〈絳侯周勃世家〉云：

²⁵ 《春秋通論》成書於康熙五十五年，排比《春秋》經文類似事件，分 40 類 97 章。其章數各家不一，《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通論》云四十篇九十九，見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影印同治七年廣東本），卷 29，頁 23-24。方苞〈春秋通論序〉自稱九十七章，然方苞〈春秋直解後序〉則云九十六章。收錄於《春秋直解》之〈後序〉計二篇，一是方苞自作，稱九十七章；一是弟子程峯所作，亦云九十七章，見方苞：《春秋直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第 140 冊），而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春秋通論》據筆者統計則為九十一章。

²⁶ 丁亞傑：「《春秋比事目錄》成書應在《春秋通論》與《春秋直解》之間，《春秋通論》雖類聚經文，但只擇其要者析論，所重在事與義，並未詳載經文出處，《春秋比事目錄》就彌補此一缺失。」，詳見丁亞傑：〈朱子春秋學的衍異：方苞春秋學的創創意圖與意義解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35 期（2008 年），頁 40。

²⁷ 方苞：〈又書貨殖列傳後〉，《望溪先生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2，頁 40。後引用方苞評點，皆用此版本，直接於引文後標明卷次、頁碼。

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文帝決其可將兵。絳侯氣質之偏，則東鄉責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櫬。微小處亦閒出相映，其法蓋取諸《左氏》。（《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補遺卷二，頁435）

方苞對於〈絳侯周勃世家〉的筆記，點出了相映筆法的關鍵，即文中「微小處亦閒出相映，其法蓋取諸《左氏》」。《左傳》以史解經，用以補充《春秋》經所發生之史事。《春秋》比事屬辭，則《左傳》載筆，亦有比事的遺跡。《史記》雖易《春秋》之編年體例為紀傳，卻繼承了其比事屬辭之精神，並且，剪裁改作大量《左傳》文字於其中，造成章法安排兩兩相映的效果。如方苞所述〈絳侯周勃世家〉，以絳侯周勃、條侯周亞夫之合傳，兩相映照，以比事連屬，合為完整的一篇文章。又如評〈管晏列傳〉，則點出其中以管仲的「三歸」、「反坫」之奢華，與晏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之儉樸，作為兩組傳主的對比，而映照成文。²⁸上述兩個例子，不論是周伯、周亞夫，抑或是管仲、晏嬰，皆是二人合傳，並且取材行文，皆互相觀照。此種情形，就《春秋》書法而言，就是比事；而就文章義法而言，即為「相映」。然而，如此兩兩相映的狀況，並不獨出現於合傳中二傳主的對映，還指一傳之中，記載歷史事件中相對的人與事：

「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正與武帝及諸臣好興事病民相反。「治務在無為而已」，語近複，然前郡守之治，後九卿之治也，其體各異，故分言之，且與張湯「文深小苛」，武帝「分別文法」反對。「面折犯顏」云云，亦與公孫宏「懷詐飾智」、阿諛取容反對。……「人果不可以無學。」篇首稱黯好學，正與此語反對。以黯為無學，故以儒術任弘也。（方苞評〈汲黯列傳〉，《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補遺卷二，頁438-439）

方苞指出，《史記》對於汲黯的種種敘述，都可以用以對映出武帝時興事病民的

²⁸ 方苞評〈管晏列傳〉云：「『三歸』、『反坫』正與『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反對。」，同前註，集外文補遺卷二，頁435。

狀態。武帝、張湯、公孫宏在歷史敘述之中，都站在汲黯的對映面，讓讀者在閱讀汲黯的傳記時，反面一想，就能夠對比出當代史，領略箇中資鑑意義。中國史官傳統，寫近代史、現代史，在政治忌諱的考量下，往往使用此種「暗對」的方法，以曲筆傳真，婉而成章。再如太史公紀錄呂氏無功而分封，即不直將此事道出，而是用長沙王對映出來：

劉、呂之禍，成於分王諸呂，故具列舊封，則後此地勢事情，了然在目；與〈秦紀〉將敘孝公修政廓土，先列六國疆界及擯秦而不與盟同。長沙獨標非劉氏以功而王，正與呂氏無功相對。（方苞評〈呂后本紀〉「是時高祖八子」，《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補遺卷二，頁434）

漢代序二等，諸侯王為廣強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皆封劉氏。異姓王者，僅長沙王以功而王，忠信有加，獨全於世。故〈呂后本紀〉特標舉長沙王，目的不在紀錄長沙王，而是暗指諸呂無功而分王的失策。司馬遷為漢武帝時人，諸呂分王、七國之亂於太史公，也不過百年間事，政權未經更迭，高祖、呂后為武帝先人，故以長沙王做映照，曲筆傳真，既能不觸犯忌諱，後能載筆其事，表達其義。

相映，與相應不同。相應，是文章間接性的結構聯結，或稱前後「伏應」，或首尾「呼應」。²⁹而相映，非指文章起承轉合的應合，而是事件、人物、章法安排的對比和對照，有時又以「照映」、「相對」、「對照」稱之。方苞以後，桐城文人受其啟發，亦帶著《春秋》「屬辭比事」書法的眼光閱讀《史記》，對於《史記》中對映的敘事安排，特別留意，並且欣賞此種義法在散行文章造成的對襯美感。其中，又以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吳汝綸《史記集評》為代表。

²⁹ 楊義談敘述學言結構要素之聯結，云：「聯結的方式有兩種，或是直接的聯結，古人稱為『過文』，強調其過渡性的價值；或是間接性的聯結，古人稱為前後『伏應』或首尾『呼應』，強調它們間的互文性或互動性的價值。」詳見楊義：《中國敘事學》，頁66-68。

一、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以相映、相對為核心

王又樸（1681-1769A.D.），字介山，天津人。師事桐城方苞，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廬州府同知。《史記七篇讀法》，刻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則有孔氏嶽雪樓影鈔本，共收有王評《史記》〈項羽本紀〉、〈外戚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七篇。³⁰七篇非王氏一時之作，乾隆二年，王又樸先著〈項羽本紀讀法〉一篇，乾隆十九年，又選評世家、列傳文六篇，合為一書，共計七篇。書前自序云：「史公蓋多恢宏譎詭之詞，不肯顯言正論，又時以他事閒文自掩其筆墨之跡，且文辭浩瀚，讀之者目眩神駭，往往一篇不能盡，故能得其旨者絕少。」，故仿朱子四書讀法例，舉《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七篇，標著讀法，以見大全。

王又樸延續方苞對《史記》「相映」義法的講究，並以七篇為例，一一闡述文章相映之處。先舉其〈項羽本紀讀法〉為例：

看他從羽叔入梁，寫梁即兼寫籍，而賓主自明，是何等手法。即單寫梁處，亦非寫梁，蓋寫梁之部勒賓客，及部屬豪傑處，乃為羽不能用人反照。寫梁擊倍陳王之秦嘉，乃為羽倍懷王約而王三秦將反照。寫梁立楚後，乃為羽弑義帝反照。寫梁不忍殺田假，乃為羽忍殺子嬰反照。（王又樸〈項羽本紀讀法〉）

〈項羽本紀〉，先寫項梁，再寫項羽。在王又樸的評點中，紀錄項梁，不只是附傳，或藉以說明項羽的發跡，更重要的，在借賓形主，照映出項羽不能用人、進退失策的缺失。其所舉之事，包括對待部屬、尊奉楚王、殺降敵人等等，都能見

³⁰ （清）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孔氏嶽雪樓影鈔本，共一卷。七篇未分卷，亦未標示頁碼。本文所引用王又樸評點，以中央圖書館孔氏嶽雪樓影鈔本為底本，僅註明其篇名，不標卷次及頁碼。

出項梁與項羽決策之不同，說明民心向背和興衰所由的聯繫。除項梁外，〈項羽本紀〉更多時候，是以劉邦作為項羽的對映對象：

如寫漢王推墮子女車下；下即寫項王之高置太公俎上。上寫滕公之救載孝惠、魯元；下即寫侯公之說請太公、呂后。……上寫羽欲聽漢和，以范增言，故急攻；下即寫漢已從羽，講以良平言，故追擊。上寫漢王患楚之圍滎陽，乃間楚；下即寫項王患越之燒楚糧，乃挾漢。上寫范增以疑去國；下即寫紀信以身代死。上寫周苛之守死不屈；下即寫曹咎司馬欣之不守約致敗。上寫楚挑戰而漢不聽；下即寫漢挑戰而楚即出。上寫陳平計間楚，而楚輒信；下即寫項王說誘信，而信不從。皆兩兩對照，或特相犯以見筆之變，或故相避以明事之同，較前又是一樣筆法。歸熙甫云史記於寫楚漢如做襍劇一出上一出下誠然也。（王又樸〈項羽本紀讀法〉）

有上下相形處，如寫梁則曰眾乃皆伏，伏其能用人也。寫羽則亦曰騎皆伏，伏其力也。寫梁不忍殺田假，下亦寫項羽不忍殺沛公，上寫沛公推墮子女，下寫項羽不棄其美人，兩兩對照等類是也。（王又樸〈項羽本紀讀法〉）

歸有光在其〈評點《史記》例意〉中以戲曲作比，留意到《史記》中敘事對象的轉換，曰：「項王與漢王，相臨廣武時如做戲一出上一出下，最妙。」³¹，說明〈項羽本紀〉視角於劉邦、項羽之間的切換。王又樸引歸有光語，除了注意到敘事對象轉換的筆法外，更進一步，留心敘事對象轉換之間，人物之間兩相對映的關係。楚漢相爭，劉邦與項羽行事大相逕庭，〈項羽本紀〉雖以項羽為傳主，卻常見沛公出現於其歷史敘事當中。此安排除可完整鋪陳史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劉邦，對映出項羽舉措的失當，因而失盡天下，自刎烏江。王又樸以相映論〈項羽本紀〉，將歸有光注意到《史記》視角轉移的觀點，進一步改良，除了敘事的

³¹ （明）歸有光：〈評點《史記》例意〉，收於《歸震川評點本史記》（光緒2年武昌張裕釗刊本，1876），卷末，頁2。

順理成章外，更製造了敘事的對比；從敘事的對比，從而寄託有價值的判斷。則其事、其文、其義便在〈項羽本紀〉的比事與屬辭中，彰顯出來。故王又樸總評此篇，最終發出「史公特地寫來，與羽兩兩對勘，此又其深文隱筆，世人莫得而知之者也。（〈項羽本紀讀法〉）」的評語。

王又樸評點《史記》七篇，除了在〈項羽本紀〉處強調相映的筆法，在其他篇章亦注重太史公相映成文，比事顯義的細節。包括〈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讀法〉、〈李將軍列傳讀法〉、〈魏其武安侯列傳讀法〉皆有跡可尋。如〈蕭相國世家〉，其曰：

第五段寫何舉素不相能之，曹參以自代，此其虛公為何如然不相能如參尚舉之，豈相知之深如信反誅之乎？正與舉信、誅信相映然。（王又樸〈蕭相國世家讀法〉）

召卒段夾入種瓜事，雖閒情冷趣，然與淮陰之誅，何之危，正映照。蓋何此時求如東陵之種瓜，而恐不能者也。（王又樸〈蕭相國世家讀法〉）

韓信「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侯功高震主，被羅織謀反之名，忠而被誅。太史公對這段近代史，深感同情。然因觸犯政治忌諱，只能以曲筆，委婉地紀錄真相於相關傳記當中。如〈淮陰侯列傳〉寫淮陰侯被誅後，用「且喜且憐之」五字，摹寫高祖，巧妙地點出了劉邦與韓信的心結，韓信被誅之理由，不言而喻。〈蕭相國世家〉寫蕭何事跡，記載蕭何知人善任的特質。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而能於病危時推薦給惠帝。那麼，蕭何相知甚深，力薦給高祖的韓信，最終卻被呂后、蕭何以計誘殺，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則以比事相映的角度閱讀此傳，便能得到蕭何雖有知人之明，卻在漢初忌憚功臣的政治氛圍下，為求自全於世，不得不做出選擇。故又夾入東陵侯召平種瓜事，以東陵侯大隱於市，映照出韓信「勇略震主者身危」，和蕭何惶惶於兔死狗烹之懼，則召平、韓信、蕭何三人，正反映出漢初對待功臣的刻薄寡恩。

還有〈魏其武安侯列傳〉，用魏其之賢，與武安侯對照，敘寫爭讓之理：

此篇自當以不能容為主，以爭讓二字為眼目，以賓客為線索，其賓客之趨避炎涼，不過為文中之渲染，非正文也。前寫魏其之賢，以為武安對照，至寫武安處，不過「辨有口」三字耳。（王又樸〈魏其武安侯列傳讀法〉）

武安之爭特不知讓，以為魏其反照，此等文法古今來惟史公獨步，此種文心亦惟史公獨得，後世不惟作者之難即求，知者而亦不可得矣。（王又樸〈魏其武安侯列傳讀法〉）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一為竇太后之姪，一為王太后之弟，是兩代外戚。竇嬰匡助漢朝平定七國之亂，提倡儒術；田蚡舌燦蓮花，逢迎阿諛，雖與竇嬰同因外戚被封，才能、行事卻大相逕庭，成為鮮明的反差。王又樸認為，〈魏其武安侯列傳〉雖為二人合傳，然太史公更用意在武安侯田蚡，寫其爭而不能容。田蚡為漢武帝的舅舅，對司馬遷而言，田蚡專橫跋扈，屬當代史，當然有其政治忌諱。因此，雖欲批判田蚡，卻不能直接寫其負面事跡，必須透過同為外戚的魏其侯竇嬰進行比事，對映出田蚡的種種不當作為，同時，也反映出武帝朝外戚專權的面象，故言「此等文法古今來惟史公獨步，此種文心亦惟史公獨得」是也。同樣以比事方法書寫當代史，尚有著名的〈李將軍列傳〉：

寫廣之數奇不侯，寫一李蔡以陪之，又帶寫廣之軍令士卒以陪之；寫廣之材武、膽略、勇健，寫一中貴人以陪之，又帶寫廣之百騎吏士以陪之；寫廣之寬仁，寫一程不識以陪之，又連寫士卒「樂從」、「愛樂為用」，并士太夫「皆哭」，百姓「皆為垂涕」以足之。尤妙於寫廣之射虎，先寫一射石，以狀廣之氣吞萬象之神勇。渲染之工，一李廣幾於栩栩欲活矣。（王又樸〈李將軍列傳讀法〉）

李廣是當代名將，戰功赫赫卻始終未能封侯。司馬遷同情其遭遭遇，故於〈李將軍列傳〉中，選用李蔡等人物作為相映的對照組，描摹出李廣以數奇之才卻未能封侯的際遇。雖未直指漢武帝賞罰不公，然其批判評價已透過李廣的生動描繪，

已不言而喻。

故總體而言，《春秋》書法比事以屬辭，司馬遷撰作《史記》，受其霑溉，亦有對比史事、人物之運用。方苞治《春秋》，聚焦比事之觀點，評點《史記》，自然留心《史記》比事之人事，鉤稽出《史記》相映的義法。王又樸紹述師說，強調文筆的相映與相對，闡釋〈項羽本紀〉、〈外戚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七篇，開啓《史記》極重要的閱讀視角。則藉由相映義法，《孟子·離婁下》所強調《春秋》之其事、其文、其義，在《史記》中得以同步彰顯。

二、吳汝綸《史記集評》以「相發」為關鍵

在王又樸後，吳汝綸也有類似的評點：

趙盾弑君與後趙鞅以晉陽畔，相映為章法。³²

司馬遷私淑孔子，典範《春秋》，蒐集天下百種遺文，運之以史筆書法，潤之以文筆詩心，撰成《史記》。據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中引書考證，《史記》載春秋史事，多徵引《左傳》，間以《國語》，進行歷史敘事文字的改寫。〈趙世家〉載「趙盾弑其君夷皋」事，有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之語，³³比對《左傳》宣公二年，「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之文字，二者文字幾如出一轍，足見司馬遷改寫《左傳》的痕跡。吳汝綸通覽〈趙世家〉全篇，認為太史公敘趙盾事，採《春秋》、《左傳》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事，寫趙鞅，再明引《春秋》，以「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

³² 吳汝綸評〈趙世家〉，（清）吳汝綸評點：《史記集評》（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年），頁621。以下吳汝綸《史記集評》，皆以此版本為據，直接在引文後括號標示所評點篇名、書名、頁碼。

³³ 〈趙世家〉：「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二十五史點校本），頁1782。

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敘事，前後皆用孔子貫穿，相映成文。

然而，若細審王又樸、吳汝綸二者所稱「相映」，則可知王又樸所稱「相映」，與「照映」、「反照」、「對照」等文字相類似。而此種類似的情形，在吳汝綸筆下，就有了進一步細緻的區別：

敘申公、巫臣與子胥、伯嚭對照。（吳汝綸評〈吳太伯世家〉，《史記集評》，頁 502）

某案此篇以相臣執政為主。前言周公相周，後言三桓專魯，兩相對照。（吳汝綸評〈魯周公世家〉，《史記集評》，頁 532）

嬰母數言，皆與項羽反照。（吳汝綸評〈項羽本紀〉，《史記集評》，頁 78）

敘子胥、白公報仇，均與頃襄王不能報仇反照。（吳汝綸評〈楚世家〉，《史記集評》，頁 593）

上述四例，或稱「對照」，或稱「反照」，實際都是以此照彼，比事以屬辭。〈吳太伯世家〉以申公、巫臣相對，〈魯周公世家〉以周公相周、三桓專魯相對。〈項羽本紀〉載陳嬰母言，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知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敘述對象雖為陳嬰，然實際也句句能用以諫項羽，說明成王敗寇的風險性。故雖語對陳嬰，實反照項羽。而〈楚世家〉用「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一段，對比出頃襄王不能報仇的史實。則歷史敘事雖言報仇，實際卻也對照不報仇的頃襄王，呈顯兩兩相映的敘事結果。由此可知，吳汝綸雖以相映評點，但實際已經細部區分了相映與相對，為兩個詞彙確立的所指內涵。

「相映」與「相對」，大同而小異。前已說明，「相映」與「相應」不同，

「相應」所指為文章起承轉合的應合，而方苞、王又樸評點所稱之「相映」，則是事件、人物、章法安排的對照，又稱「照映」；有時還因比事乃運用差異對比而成，故「相映」中，還有「相對」、「對照」的成分。然而，吳汝綸很明顯地又將「相映」與「相對」兩個詞彙區別開來。在吳汝綸的評點中，「相映」，是運用兩種相當的人物、史事，進行敘事；「相對」，則更強調二者間的差異性，運用差異化進行對比。李長之曾舉例說明《史記》有對稱律、對照律，³⁴與吳汝綸評點中的「相映」與「相對」互通。然而，不管是「相映」還是「相對」，「對稱律」還是「對照律」，基本上都還是從屬辭比事的敘事傳統而來，由於比事，故有相映和相對、對稱與對照的佈局，而有文章兩兩相映的偶對義法。

值得注意的是，吳汝綸不獨用「相映」一詞，更多時候，他注重太史公行文「相發」之處，如其評點〈白起王翦列傳〉王翦向秦王乞貸事件，即曰：

發明秦王之雄猜，與白起賜死相發。而折始皇最奇警，始皇聞此等語知其無大志，故善笑而不之罪，亦與白起事相發。昭王與始皇前後一轍也。（吳汝綸評〈白起王翦列傳〉，《史記集評》，頁834）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為去秦王疑心，臨行前向秦王請美田宅園池甚眾。既至關，又遣使向秦王請善田者五輩。太史公透過王翦之口，秦王猜忌多疑的性格由是可知。而透過王翦與秦始皇的互動，白起被昭王賜死一事，便得以互相發明。既載秦王之雄猜，又寫為將自全之道。就章法來說，此種「相發」，既是「相映」，也是「相對」。在吳汝綸的《集評》中，所引張裕釗之評點，也有「相發」的類似評點角度，如張裕釗評〈春申君列傳〉，云贊語首句「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和「珠履事相發」，³⁵即表明了「相發」一詞，所指除

³⁴ 李長之之定義「對照律」：「司馬遷往往用兩種突出的性格或兩種不同的情勢，亦或兩種不同的結果，作為對照，以增加作品的生動性。」，並指出：「大抵司馬遷在寫合傳的時候，如果不用對照律，便往往用對稱律，當然也有時二律並用。」見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北：台灣開明書局，1968年），頁282、287。

³⁵ 張裕釗評〈春申君列傳〉，收入吳汝綸：《史記集評》，頁863。

相映、相對之外，還有兼具有前後呼應的作用。而透過「相發」的評點，直指相映所欲寄託之義，故「相發」之目的，在主旨的闡釋：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謂方士僞道皆傳會黃帝也。此句與上「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句相發。（吳汝綸評〈五帝本紀〉，《史記集評》，頁7）

史公於〈君奭篇〉獨舉湯有伊尹、大戊，有伊陟、臣扈云云者，此篇以用人為主，噲用子之而亂，昭王用樂毅而興，皆與此相發也。（吳汝綸評〈燕召公世家〉，《史記集評》，頁533）

前敘《詩》、《書》、《易》、《禮》，至此乃折入《春秋》，史公以《春秋》為重，且與己作《史記》相發。（吳汝綸評〈孔子世家〉，《史記集評》，頁678）

〈五帝本紀〉曰：「《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此語除在說明太史公載筆之態度，以信史為依歸之外，更重要的，是諷喻當代，從源頭上糾正方士種種附會之說。故知此語，實與「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互相發明，以信史與附會作比，對照出實事求是與荒誕不經的差別，透過二句相發，可見太史公勸誡今上之旨趣。評〈燕召公世家〉周公因召公之疑，作〈君奭〉一段，點出太史公剪裁其文，聚焦用人之處，與後來燕之因用人而有其興衰互為表裡，發揮該篇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之宗旨。又，吳汝綸評〈孔子世家〉中司馬遷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段，更讀出司馬遷載筆之旨，將自身與孔子相發，將《史記》與《春秋》相發。

發，是發明、發揮、闡發之義，比較「相映」、「相對」與「相發」，可知「相發」者，以其文而言，包含了「相對」與「相映」；就其義來說，是其文、其事、其義之融通，比事以屬辭，照映以顯義。故較諸方苞、王又樸之「相映」，是對「其文」的歸納；吳汝綸之「相發」，更強調「其義」的連結。

三、其他明清學者對於《史記》評點對稱敘事之論述

方苞自《春秋》入手，標舉《左傳》、《史記》，以爲古文範本，而能入門須正，掌握屬辭比事的敘事評點角度，鉤稽出太史公行文有偶對之義法。其後王又樸、吳汝綸，皆屬清代桐城派文人。那麼，就《史記》研究史而言，其他《史記》研究家是否也有相近的觀點呢？關於此點，可以透過歷時性與共時性的考察，以窺其大要。

以明萬曆年間集成之《史記評林》作爲歷時性比較之對象，其諸家評點，較重視「敘事之法」的是凌約言與楊慎。³⁶〈高祖本紀〉敘呂公善面相能識人，以女妻之，凌約言評曰：「觀此文，伸縮起伏，簡潔嚴明，而敘事之法，亦具於此矣」³⁷，凌氏聚焦在太史公之行文佈局，點出司馬遷建構敘事視角預留伏筆的方式。如〈陳涉世家〉在篇末寫陳涉稱王後，濫殺舊友，導致無親陳王者，以補敘的方法，檢討陳涉失敗之由。楊慎評其曰：「既敘陳涉發難之顛末，又原其所以敗之故而申言之，敘事之法也。」³⁸，則楊慎已發掘太史公將此段補敘於篇末，用以解釋陳涉失敗的原因。篇首著其興，篇末論其亡，互相呼應。則知凌約言、楊慎二人的言敘事之法，乃關注其敘事的順序，聚焦在結構佈局的前後呼應。再如〈項羽本紀〉爲例，全文並提項羽、項梁，事跡交錯敘述，故茅坤曰：「籍紀中攙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序。」³⁹，即關注太史公敘事視角之轉移。而鴻門宴中寫「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單就「西嚮立」三字，凌約言即點出「上已紀坐次，至此猶不脫西向立三字，非特照應有情，描寫當日光景，宛然在目，何等針線。」⁴⁰，則知其所關注者，在敘事之首尾伏應。故總體而言，《史記評林》雖已有「敘事之法」之討論，然其側重之焦點，乃在其敘事次序、敘事視角，以及

³⁶ 周建渝：〈從《史記評林》看明代文人的敘事觀〉，頁 90。

³⁷ （明）凌稚隆輯，（清）李光縉增補，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 年），頁 289。

³⁸ 同前註，頁 1555。

³⁹ 凌稚隆輯，李光縉增補，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頁 245。

⁴⁰ 同見註，頁 262。

佈局的前後呼應，而尚未關注到太史公行文有兩兩相映的對稱律。換言之，《史記評林》所關注的，為相應，是事件文脈的梳理；而方苞、王又樸、吳汝綸等人所謂相映、相對、相發，則是比事屬辭的勾勒，與對照律、對稱律遙應。

再就共時性考察，清代除了桐城派，《史記》評點大家的吳見思，也有類似的看法，在其《史記論文》一書中，每標以「對看」之語，可用「對看法」稱之：

「徙跣」與「劍履上殿」對看。^{④①}

先寫項羽一紀，接手又寫高祖一紀，一節事分兩處寫，安得不同？乃羽紀中字字是寫項羽，高紀中字字是寫高祖。兩篇對看，始見其妙。^{④②}

取債一段，刪改《國策》，各有佳處，對看自見。^{④③}

吳見思評〈蕭相國世家〉，以蕭何與他人相比，用「萬世之功」、「一旦之功」作為比事之脈絡，以為全傳「兩數矣相照」。^{④④}如上引「劍履上殿」、「徙跣」，即是此類比事。並提出〈高祖本紀〉與〈項羽本紀〉對看、〈孟嘗君列傳〉與《國策》對看，可知吳見思所言「對看」，實際包括了同篇對看、或異篇對看、或與他書對看三類。^{④⑤}與他書對看，屬於歷史編纂學之範圍；而同篇對看、異篇對看二種，則與比事屬辭相關。同篇對看與前述「相映」、「相對」、「相發」同通；異篇對看，吳見思有時又稱以互見省筆法，可知其為蘇洵「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狹義互見法^{④⑥}的延伸說明。事實上，吳見思除了對看法之外，還提出了重

④① 吳見思評〈蕭相國世家〉，（清）吳見思：《史記論文》（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年），頁314。

④② 吳見思〈高祖本紀〉總評，同前註，頁79。

④③ 吳見思評〈孟嘗君列傳〉，同前註，頁412。

④④ 吳見思評〈蕭相國世家〉，同前註，頁313。

④⑤ 張富春：《清吳見思《史記論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26-28。

④⑥ 張高評〈《史記》筆法與《春秋》書法〉一文，分互見法為廣義與狹義二種，其中，「事見某篇」者，屬於狹義互見法。詳見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頁84-85。

還熟複之法、頓挫波瀾之法、倒提作襯之法、兩半篇體結構法、追頂作敘法、夾敘法、倒提法、單徑敘事法、小中見大法等一系列的筆法，⁴⁷其評點《史記》對看法，更側重在異篇對看之處，反之，同篇對看法所佔全部評點文字篇幅甚小，僅偶一提及，並未多加著墨。可知屬辭比事所造成的對稱律，是吳見思評點筆法之一，並非其特別側重處。

除了吳見思，清代《史記》評點，還有牛運震的《空山堂史記評註》。牛運震雖未有相映的說法，卻點出《史記》中「對照」、「照應」之處。如其評〈吳世家〉「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夾批有「此帶敘虞事，與吳對照，有情。」語。⁴⁸又如評〈李斯列傳〉中「竟并天下」、「遂以亡天下」之處，則以「前後兩截照應，極分明，極老健」點評⁴⁹，皆屬此例。然而，與「對照」「照應」相比，牛運震對《史記》的評點，更重視敘事的「呼應」之處。如其評〈刺客列傳〉「燕太子丹者」至「國小，力不能」一段，稱「敘事中有呼應，故靈。」⁵⁰；而評〈項羽本紀〉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亦與『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遙應有情。」⁵¹，皆是聚焦在行文前後呼應的安排。此類呼應的評點為牛運震評點《史記》之大宗，全書中屢屢可見，可以推得「呼應」為牛運震評點側重所在，而「對照」、「照應」與之相較，亦非其著力留心之處。

承上所述，「相映」與「相對」的對稱敘事，就歷時性來說，明嘉靖年間集成評點百種的《史記評林》，並未能特別標舉此點，一直要到清初的方苞，自比事屬辭角度切入，方著意勾勒太史公行文兩兩相對的敘事特性，由弟子王又樸一脈相承，至晚清吳汝綸仍可有相關的評點看法。而就共時性考察，與方苞、王又樸同時代的吳見思與牛運震《史記》評點二大家，雖有相映的類似說法，然其所指，或與更著力於異篇對看的互見之法，或更用意於呼應之處，可知偶對之行文

⁴⁷ 張富春：《清吳見思《史記論文》研究》，頁 56-68。

⁴⁸ （清）牛運震撰，崔凡芝校釋：《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242。

⁴⁹ 同前註，頁 502。

⁵⁰ 同前註，頁 490。

⁵¹ 同前註，頁 80。

義法，並非他們用以評點《史記》的重點。則知《史記》中兩兩相映的偶對義法，是在清代桐城派的手中被開發出來，影響桐城派文論，同時也成為《史記》敘事學中重要的一環。

應當辯證的是，勾勒對稱敘事、偶對義法的特色，與科舉時文的關係。學者比較古文辭派與唐宋派的《史記》評點，認為古文辭派重視《史記》作為文章典範的意義，而唐宋派古文家則由於重視八股文式的文章結構分析，因而對《史記》的結構較為關注。⁵²而研究清代桐城派文論，或有以時文論古文之說，並以為其重視駢行對稱之章法，亦受八股時文之影響。然而，就《史記》評點來說，除方苞、王又樸等桐城派文人，挖掘偶對義法，其他非屬於桐城派的《史記》研究家，如牛運震、吳見思，或多或少亦對《史記》「相映」、「相對」行文進行論述。則對屬辭比事、科舉時文、《史記》偶對義法之評點，三者錯綜之關係，筆者以為，應當作以下解讀：由於科舉時文，致使文章家注重文章結構分析。《史記》作為文章範本，自然是其分析的對象。然《史記》有淵源自史學屬辭比事的傳統，不論是異篇對看，或同篇對看，敘事本身即具備偶對性。桐城派先立其大，自《春秋》入手，掌握屬辭比事之義，又關注敘事結構，故評點《史記》，自然聚焦於偶對之義法。換言之，與其將桐城派偶對義法之發掘，歸因於其時文的審美傾向，不如請循其本，將之上溯到《春秋》比事屬辭的脈絡，由比事屬辭一貫而下，使後來《史記》評點中，對稱敘事的偶對義法得以落實。

肆、結語

馮班曰：「《史記》敘事，如水之傳器，方圓深淺，皆自然相應。來人論文有照映波瀾起伏等語，若著一字於胸中，便看不得《史記》。」⁵³，《史記》吸收先秦百種材料，融會貫通，以己意出之，成為敘事傳統經典之作。其行文風格，成為後代文人仿效之典範；而其文章義法，成為明清文人評點之對象。然而，若

⁵² 高津孝：〈明代評點考〉，《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頁93-94。

⁵³ 楊燕起等：《史記集評》（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頁175。

僅執著於某篇某法，忽略其種種敘事法，所寄託之義，則如盲人摸象，無法窺其全豹。故正本清源，以屬辭比事傳統的背景考察，太史公敘事之文，當與其事、其義而發。則以屬辭比事之角度評點《史記》，便能掌握根本之義法。

本文以桐城派方苞、王又樸、吳汝綸三人《史記》評點著作為核心，鉤稽太史公敘事筆法之對稱律，比較其他明清相關評點著作，耙梳《史記》對稱敘事評點之發展梗概，得出以下幾點觀察：

其一，司馬遷私淑孔子，典範《春秋》，在屬辭比事的傳統中撰成《史記》。其剪裁史料，敘述史事，本身即具有歷史解釋的成分。故以《史記》為文學經典，梳理其敘事理論，不能脫離史傳文學傳統而發，而得《史記》乃以屬辭比事作為其核心的敘事策略。

其二，桐城派評點《史記》之偶對義法，注重其行文結構，不論所舉為相類，亦或相反之人事，皆注重敘事之對稱律。進一步就兩兩相映的人事，比其事，而論其義。

其三，桐城派評點《史記》之對稱敘事，自方苞發端，由王又樸、吳汝綸先後繼承發揚。方苞對比《左傳》，注重《史記》行文兩兩相映之處。王又樸延伸閱讀，評點《史記》七篇，以相映、照映、反照、對照等稱之。吳汝綸則區別相類史料為相映，相反史料為相對；並注重對稱敘事與主旨之「相發」處，比事以顯義。

其四，桐城派評點《史記》之對稱敘事，迥異於明代《史記評林》評點側重文章起承轉合的前後伏應。而和清代其他《史記》評點家，吳見思、牛運震相較，吳見思歸納《史記》敘事種種筆法，未掌握太史公屬辭比事敘事策略，強調敘事之對稱性；而牛運震則看重行文之上下呼應，與明代評點諸家相類。則可知《史記》之對稱敘事，是清代桐城派《史記》評點所側重。

總體而言，以屬辭比事的敘事策略觀察，對稱敘事為《史記》評點的重要閱讀視角。就太史公而言，藉由屬辭比事，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得以合二為一，能使其事、其文、其義，鎔鑄於一。而就讀者接受來說，能從《史記》比事、屬辭的對稱敘事當中，推得其義，而能得太史公究際天人、通變古今，成一家言之要義。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二十五史點校本。
-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8。
- 明·凌稚隆輯，清·李光縉增補，（日）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
- 明·歸有光評點，《歸震川評點本史記》，武昌：張裕釗刊本，1876。
- 清·方苞，《望溪先生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代詩文集彙編本。
- 清·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孔氏嶽雪樓影鈔本，序於乾隆 19 年，1754。
- 清·牛運震撰，崔凡芝校釋，《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
-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
- 清·吳見思，《史記論文》，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7。
- 清·吳汝綸評點，《史記集評》，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

二、近人論著

（一）專著

- （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陳新譯 2009《元歷史：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南京：譯林出版社。
- （英）托西（John Tosh）著，趙干城、鮑世奮譯 1988《史學導論》（The pursuit of history :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英）愛德華·卡爾（Edward H. Carr），王任光譯 1988《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台北：幼獅文化出版公司。
- 王靖宇 2003《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余英時 1980《戴震與章學誠》，台北：華世出版社。

李長之 1968《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北：台灣開明書局。

杜維運 1993《中國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

柳詒徵 1948《國史要義》，上海：中華書局。

高津孝 2002〈明代評點考〉，《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高評 2002〈《史記》筆法與《春秋》書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張富春 2008《清吳見思《史記論文》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楊伯峻編著 1993《春秋左傳注》，台北：洪葉文化。

楊義 1997《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

楊燕起等 2005《史記集評》，北京：華文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

張新科〈史記研究史述略〉，《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6卷第4期，2005年。

劉寧〈歷代《史記》敘事研究綜述〉，《江淮論壇》2006年第3期。

周建渝〈從《史記評林》看明代文人的敘事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Narrative Commentary of *Shi-Ji* and Method of Explain by Relevant Comparison

Chyu, Shih-Wen

Contractual Lecturer,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writing includes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Sima Qian's use the method of explain by relevant comparison, as a way of combining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thod of explain by relevant comparison and the narrative commentary of “shi-ji”. It points out the commenter by Tongcheng School in Qing Dynasty used the method of explain by relevant comparison to commentary the Narrative of Shi-Ji.

Keywords: Shi-Ji, Sima Qian, Narrative Literature, Explain by Relevant Comparison, Commentary of Shi-Ji